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的实证研究

赵翠兰 苏春景

【摘要】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是“乡土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方面。以 1369 名农村中小學生(11~18 岁)为样本,以调查问卷为主,访谈法为辅,运用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文本分析法,从方言使用、方言态度和方言他者期待等方面探究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问题。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學生在私人领域的方言使用呈上升趋势,但普通话在公私领域均占绝对优势;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的态度呈上升趋势,对普通话的态度则呈下降趋势;他者(国家、学校、教师)对农村中小學生的方言期待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公、私领域的方言使用、方言和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对公、私领域的方言使用影响最大。研究结论:农村中小學生存在方言选择、方言情感和方言他者期待三方面的认同困境。应进一步处理好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方言认同是静态性还是流变性的问题。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实证研究;语言多样性

随着我国经济崛起和文化觉醒,学者逐渐将眺望大洋彼岸的眼光拉回到孕育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重新审视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城市与农村等对立概念间的内在关联。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农村貌似对立的背后蕴藏着“乡土性”这个共同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中国社会是包括中国农村和城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运行和生活形态都是以‘乡土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②“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原有乡村社会的模式”(城市)人物的感受方式待人接物与人生理想与古代的乡村社会没有鲜明的差异。”^③自 2002 年始,中央政府强调城乡统筹(2002 年)、城乡一体化(2012 年)、乡村振兴战略(2017 年)等政策,“主要目的是努力维持乡土社会的可持续”^④。乡土社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之一在于乡土文化的振兴。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了乡土文化的历史记忆。201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及“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⑤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历经千百年锤炼的方言文化积淀了丰富、多样、珍贵的精神营养。”^⑥

赵翠兰,教育学博士,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青岛 266071);苏春景,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64000 烟台)。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依法治国与公共道德教育研究”(15JJD880010)资助课题研究成果。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3 年,第 1 页。

②冯婷:《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浙江社会科学》2019 年第 6 期。

③王宏图:《都市人的原始野性与救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9 期。

④邱建生、杨帅、兰永海、温铁军:《中国社会变迁与乡村文明建设》,《行政管理改革》2013 年第 3 期。

⑤《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5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⑥黄晓东:《浙江省方言文化教育:现状、问题及展望》,《文化遗产》2018 年第 3 期。

“但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导致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走向衰微。”^①对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农村中小学生,方言浸润着他们内在的生命底色,他们的成长过程既再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样态,又将在很大程度上承袭和生成城市文化的思维模式,他们对方言的习得和认同,直接影响了乡土文化的存续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乡土文化的振兴,直接关联着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因此探究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认同状况,对于挽救方言,复兴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重建精神家园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语言乃存在之家”的理论出发剖析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认同状况,方言认同存在的困境,并进一步探讨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方言认同的流变性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 方言认同相关研究

根据语言学家的观点,方言是语言的一种,方言和语言就其结构系统而言都是自足的,二者作为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它们的差别只在于社会政治身份的不同。^②因此,从理论上说,语言认同和方言认同具有相同的内在机制。国内外学者虽然多以“语言”来探讨认同问题,但其相关思想及其认同机制同样适合于方言认同。

国内外学者对方言(语言)认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对认同的理解。当前学者对认同的理解经历了从本质观到建构论的转变,早期学者将认同看做是静态的,但随着社会流动、多元化思想的影响,逐渐将认同看做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③二是方言与认同的关系。从国内外研究来看,方言与认同的关系比较复杂。学者周庆生指出,“语言(方言)与认同的关系也不简单,有的是标识关系,有的是映射关系,有的是建构关系,有的是一对一的对应,有的是一对多的对应。”^④三是方言认同的主客观问题。以往方言(语言)认同凭借“想象的共同体”^⑤“精神言语社区”^⑥等概念,将其看作个体纯主观的现象,很少将他者认同、实践性等概念纳入考查范围。也就是说,方言(语言)认同会受到生存空间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制约。^⑦特别是母语研究专家斯古纳伯-康格斯(Skutnabb-Kangas)、菲利普森(Phillipson)提出,在界定一个人的母语时,相对于自我认同而言,他者认同的参考价值更大,这也是遵循群体优先的原则。^⑧即方言认同是一个双通道的认同过程,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将个体与群体的心理联系在一起。^⑨四是方言认同的维度,即方言的哪几个方面与认同相关或者影响认同。有学者侧重于单一认同,如方言(语言)行为,^⑩方言(语言)使用^⑪,(语言)态度^⑫;也有学者

①田立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缘起及意义》,《语言文字应用》2015年第4期。

②胡明扬:《语言和方言》,《语文建设》1991年第4期。

③K. Managan, “A Review of *The Blackwel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in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Vol. 21, No. 2, 2011, pp. 281–283.

④周庆生:《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1期。

⑤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 45, No. 2, 2009, p. 216.

⑥何丽:《精神言语社区:语言身份的选择及构建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⑦方小兵:《当前语言认同研究的四大转变》,《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3期。

⑧T. Skutnabb-Kangas & R. Phillipson, “Mother tongue: The theoretical and socio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 in U. Ammon (ed.), *Status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s and Language Varieti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pp. 450–477.

⑨方小兵:《当前语言认同研究的四大转变》。

⑩盛柳柳、严建雯:《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5年第1期。

⑪姜瑾:《语言·社会·生态社会语言学动态应用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48页。

⑫王玲:《农民工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及机制分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侧重多维认同,如方言(语言)使用、方言(语言)态度、方言(语言)意识;^①另外爱德华兹(Edwards)提出方言(语言)认同包括情感、认知和使用倾向三要素。^②丹尼斯·埃杰(Dennis Eger)提出方言(语言)认知、方言(语言)情感和方言(语言)意动。^③五是单语、双语或多语的认同问题。受单语主体的影响,同一主体的方言(语言)认同要么是单一认同,要么认同存在主次之分。方小兵指出,国内学界对双重或多重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许多美国年轻一代拉丁裔移民既认同拉丁文化,又认同美国文化,把“西班牙语-英语”(Spanglish)看作拉丁美国人的身份象征,墨西哥裔喜欢称自己是 Mexican-American,“两个英语词用连字符连接,就成了一个词,表明两个成分是密不可分的”。^④

(二)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相关研究

本研究中农村中小學生是指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并就读于村落、镇区、镇乡结合部学校的小初高中阶段的学生群体。据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2020 年统计数据显示,当下我国共有农村中小學生 5332 万余人,占全国中小學生总人数的 30.7%。受城市化影响,我国农村中小學生处于“生活在别处”^⑤的状态:身在乡村,心念城市;言说方言土语,追逐标准普通话。

从国内已有研究看,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对农村中小學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网络学习对比^⑥、教育公平^⑦、身心健康^⑧等方面。国内对学生群体的语言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儿童^⑨和进城务工子女^⑩。研究发现,进城务工子女对方言存在自卑感,努力向普通话靠拢,导致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身心异域”状态^⑪;在小学阶段,城市儿童和进城务工子女随着年龄增长,均出现“方言回归”现象^⑫;青少年“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过渡到使用本地方言为主并接近上一代的语言使用状况”^⑬;方言语言环境阻碍了方言—普通话双语儿童的元语言意识的发展^⑭;方言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言既可以作为一种经济工具对增进物质利益的作用^⑮,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对个体积累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非物质利益具有促进作用^⑯。

①杨荣华:《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以辰州话方言岛为例》,《语言科学》2010 年第 4 期。

②J. Edwards, *Languag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3.

③丹尼斯·埃杰:《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吴志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第 15—36 页。

④E. Morales & E. Beier (eds.), *Living in Spanglish: A Search for Latino Identity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2, pp. 43—58.

⑤任强:《逆天与顺天:农村教育文化的阙失与复归》,《中国教育旬刊》2020 年第 3 期。

⑥徐小琪、李燕凌、孙计领:《城乡中小學生使用互联网学习现状的对比分析——基于 CFPS2016 数据》,《中国电化教育》2018 年第 7 期。另参见李葆萍:《中小學生信息化学习能力城乡差异分析——基于北京市的实地调查》,《中国教育旬刊》2013 年第 3 期。

⑦冯建军:《高中教育公平的哲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另参见杨东平:《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新问题》,《基础教育》2015 年第 12 期。

⑧杨华:《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⑨俞玮奇:《城市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年龄变化——南京市中小學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2012 年第 3 期。另参见汪平:《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⑩方小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小学阶段的语言适应与语言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另参见何丽:《精神言语社区:语言身份的选择及构建研究》。

⑪赵翠兰:《语言存在论视角下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状态透析》,《教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⑫俞玮奇:《城市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年龄变化——南京市中小學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另参见方小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小学阶段的语言适应与语言认同》。

⑬郭骏:《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几点思考》,《语言文字应用》2013 年第 4 期。

⑭胡永祥、李荣宝、李光泽、郭琳琳:《方言的社会认同度对双语儿童元语言意识发展的影响》,《学前教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⑮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2015 年第 2 期。另参见金江、尹菲菲、张莉:《方言能力与流动人口的借贷机会——基于 CLDS 的经验研究》,《南方经济》2017 年第 9 期;杨晔、朱晨、谈毅:《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社会》2019 年第 1 期。

⑯柳建坤、张云亮:《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社会》2020 年第 5 期。

从国外研究来看,欧盟“1+2”的语言学习项目以及“语言学习和语言多样性行动计划”,均是在研究促进多语言认同和多语言价值平等的问题。埃洛诺拉·科瓦克斯·雷格(Eleonora Kovacs Rac)对匈牙利农村300名12岁和15岁学生方言态度的研究发现,方言对他们很有吸引力^①。莫汉·辛格·沙特(Mohan Singh Saud)发现尼泊尔语言多样性课堂成为学习者发展有效跨文化能力的宝贵资源,^②奥克利·韦尔普(Oakleigh Welply)对比英法两国小学“移民儿童”的方言认同发现,法国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价值取向和英国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价值取向,使得儿童对方言表现出拒绝或亲近的认同倾向。^③

综上,关于方言(语言)认同的研究,在理论上尚处于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到多元,从单向到双向,从自我到他者,从一维到多维的演变过程。对方言认同的动态性、多元性、双向性、实践性和多维性的研究正处于探索中;而对学生群体的方言认同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中小学生和进城务工子女。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学者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认同研究。本文基于乡村振兴的背景,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访谈法为辅,参照以往学者对方言认同维度的划分,结合研究者本人的学术思考,同时又基于当下中国农村公、私领域界限逐渐分明的现实,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导致个体对他者认同具有强烈愿望这一事实,将方言认同分为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私人领域方言使用、方言态度、普通话态度和方言他者期待,并探究方言认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既能反映我国社会和文化系统对于方言和普通话的开放和接纳程度,又能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研究方法。问卷经过发放回收、录入统计、探索以及信效度检验等过程。访谈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之后进行,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随机访谈11名学生,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

(二) 研究工具

1. 问卷设计

首先,确定问卷维度。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樊中元^④、余玮奇^⑤和杨荣华^⑥等学者的语言认同调查问卷的研究与分析,并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确定了方言认同调查问卷的六个维度,并对各维度赋予明确的内涵。

其次,编写问卷题项。在理论推导和小样本探索的基础上编写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认同初始问卷36个题项。之后发给语言学专家对问卷题项的可读性和适宜性进行修改,删除其中的一个维度和7个题项,并对表达有歧义的题项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5个维度29个题项的《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认同调查问卷》。

①E. K. Rac & S. Halupka-Rwsetar, “Sense of Local Identity Attitude toward Dialects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 Serbia”, *Poznan Studies in Diversity in the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Vol. 54, No. 1, 2018, pp. 115 – 146.

②M. S. Saud,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he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Classroom in Nepal: Challenge or Ch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Vol. 7, No. 1, 2019, pp. 70 – 83.

③O. Welply, “Language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in multicultural classrooms: The views of ‘immigrant-background’ children in French and English primary schools”,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40, No. 3, 2010, pp. 345 – 358.

④樊中元:《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0期。

⑤余玮奇:《城市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年龄变化——南京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

⑥杨荣华:《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以辰州话方言岛为例》。

再次,对问卷进行预测。抽取五年级、六年级、初二、高一的农村中小学生共计 110 名,对初步编制的问卷进行预测。使用 SPSS20.0 对预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删除 8 个题项,最后形成五个维度共 21 个题项的正式问卷,包括公共领域方言使用(4 项)、私人领域方言使用(4 项)、方言态度(5 项)、普通话态度(5 项)、方言他者期待(3 项)。

最后,对问卷进行正式施测。选取山东青岛即墨区、胶州区村小 5 所、初中 2 所、高中 2 所,共抽取 1800 名农村中小学生,用正式形成的《农村中小学生方言认同问卷》进行施测。共回收问卷 1710 份,去除 341 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1369 份,有效率 80%。

2. 问卷的统计分析

(1) 预测问卷项目分析

研究用各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和经校正的题总相关(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ITC),来删除不合适项目。本研究删除 Pearson 相关系数在 0.4 以下的 3 个题项,保留在 0.01 水平上呈显著相关的 26 个题项,可以认为问卷所有题项设计合理,且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2) 预测问卷信度检验

信度指的是测量结果的稳定性程度。本研究采用 SPSS20.0 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选用了同质信度中的克隆巴赫系数来检测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总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是 0.731,说明信度指标比较理想。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公共领域方言使用		私人领域方言使用		方言态度		普通话态度		方言他者期待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16	0.662	8	0.881	6	0.77	5	0.751	7	0.686
18	0.517	4	0.582	21	0.828	9	0.668	10	0.776
20	0.784	14	0.783	17	0.577	15	0.589	13	0.787
22	0.823	11	0.877	12	0.739	19	0.797		
				24	0.75	23	0.68		

(3) 预测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问卷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0$),KMO 值为 0.88,非常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本研究探索性因素分析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倾斜旋转法,判别标准选定特征值大于 1,析出因子个数不设限。第一次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存在部分条目的项目载荷值小于 0.4。因此,逐次删除了负荷最低的条目,每删减一次均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考察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贡献率增减情况。经过筛选后,共删除 5 道题项,最终得到 21 个题项,隶属五个因子。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总变异量为 61.47%。结果见表 1。

(4) 正式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

选用验证性因素分析估计构想模型对实际测量数据的拟合程度,从而检验构想模型的正确性。拟合指标的理想数值要求如下:一般认为, χ^2/df 接近 2,模型拟合较好,样本较大时,5 左右也可接受;拟合优度指标 GFI 越接近 1 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通常采用 $GFI>0.9$;相对拟合指标 CFI 越接近 1 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近似均方根误差 RMSEA 越接近 0 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通常采用 $RMSEA<0.05$ 。利用 Mplus8.1 软件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从研究各指标来看,本模型的数据拟合良好。

表 2 主要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GFI	RMSEA	CFI	NFI	TLI	IFI
1027.009	179	5.737	0.927	0.059	0.924	0.909	0.911	0.924

（三）研究过程

最终问卷由基本情况、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私人领域方言使用、方言态度、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 24 个题项组成。基本情况 3 个题项包括性别、年龄和居住状况,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方言使用共 8 个题项,每个题项包括“普通话”“方言和普通话”“方言”三个水平,分别赋值 1、2 和 3;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法,“1 表示非常不好”“2 表示不太好”“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好”“5 表示非常好”;方言他者期待 3 个题项,包括“普通话”和“方言”两个水平,分别赋值 1 和 2。

本研究的统计学方法采用 EpiData3.1 软件录入数据,运用 SPSS20.0 处理数据。公私领域方言使用、方言和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的年龄差异运用方差分析,方言认同各因子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于农村中小學生日常生活主要使用方言和普通话,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作为乡土文化系统中的方言和普通话,是共时性、整体性存在的,当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的认同偏高时,背后则意味着对普通话的认同偏低。因此,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通过对方言和普通话在年龄方面的比较来呈现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状况。

三、数据分析结果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的研究,一是通过年龄和性别差异的比较呈现认同的变化,二是探究方言认同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运用 SPSS20.0 进行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性别方面,农村中小學生的方言认同基本没有差异,而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學生的方言认同存在差异。公、私领域方言使用,方言和普通话态度,方言他者期待相关性显著。

（一）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的年龄差异

1.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使用的年龄差异

运用 SPSS20.0 对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使用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3 和表 4。表 3 呈现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使用年龄差异的整体情况,表 4 呈现的是不同交流对象和交流情境中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使用年龄差异的具体情况。

表 3 年龄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上的 ANOVA 检验

		年龄								F	P	Bonferroni
		11 岁	12 岁	13 岁	14 岁	15 岁	16 岁	17 岁	18 岁			
私人领域	M	1.849	1.934	1.965	2.141	2.111	2.215	2.106	2.263	7.496	0.000	11 < 12 < 13 < 17 < 15 < 14 < 16 < 18
	SD	0.672	0.749	0.654	0.642	0.590	0.630	0.690	0.690			
公共领域	M	1.755	1.843	1.730	1.872	1.750	1.828	1.769	1.843	1.243	0.276	年龄在公共领域的方言使用差异不显著
	SD	0.656	0.717	0.634	0.650	0.635	0.651	0.592	0.670			

由表 3 可知,私人领域中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使用随着年龄增长具有显著差异,公共领域则没有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學生的方言使用在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11~18 岁:1.849~2.263);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的所有数值来看,除了私人领域的 14~18 岁这五个年龄的数值在 2 以上之外,私人领域 11~13 岁这三个年龄和公共领域 11~18 岁这八个年龄的方言使用的数值都在 2 以下,这说明普通话超过方言的使用,普通话在总体上占优势。

Bonferroni 事后检验发现,在私人领域中,农村中小學生 18 岁时方言使用高于其他年龄,11 岁显著低于其他年龄;公共领域的方言使用在 11 至 18 岁(1.755~1.843)这十个年龄段差异不显著。

由表 4 可知,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學生与父母、兄弟姐妹、同学等交流对象以及在村中的方言使用均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普通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在集市、打电话和接电话等情境中方言

使用差异不显著。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普通话的使用在总体上依然占绝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接电话比打电话更多地使用普通话,这说明农村中小學生將未知來電人員的身份置于公共領域,而打电话因确知对方身份则自主选择使用方言或普通话。

表 4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使用的年齡差異

维度	最多使用	对象和情境								F 值	P 值	Bonferroni
		11 岁	12 岁	13 岁	14 岁	15 岁	16 岁	17 岁	18 岁			
		n = 154 M ± SD	n = 162 M ± SD	n = 195 M ± SD	n = 236 M ± SD	n = 189 M ± SD	n = 226 M ± SD	n = 92 M ± SD	n = 75 M ± SD			
私人领域	与爸爸交谈	2.026 ± 0.870	2.031 ± 0.881	2.113 ± 0.804	2.284 ± 0.788	2.317 ± 0.725	2.414 ± 0.783	2.272 ± 0.813	2.480 ± 0.811	6.896	0.000 ***	11 < 12 < 13 < 17 < 14 < 15 < 16 < 18
	与妈妈交谈	1.955 ± 0.858	1.994 ± 0.874	2.092 ± 0.794	2.246 ± 0.777	2.243 ± 0.768	2.383 ± 0.774	2.228 ± 0.813	2.387 ± 0.868	6.779	0.000 ***	11 < 12 < 13 < 17 < 15 < 14 < 16 < 18
	与兄妹交谈	1.844 ± 0.849	1.926 ± 0.823	1.938 ± 0.777	2.114 ± 0.766	2.000 ± 0.792	2.158 ± 0.823	2.098 ± 0.839	2.267 ± 0.905	4.223	0.000 ***	11 < 12 < 13 < 15 < 17 < 14 < 16 < 18
	与同学交谈	1.571 ± 0.645	1.784 ± 0.802	1.718 ± 0.607	1.919 ± 0.664	1.884 ± 0.608	1.906 ± 0.646	1.826 ± 0.705	1.920 ± 0.712	5.648	0.000 ***	11 < 13 < 12 < 17 < 15 < 16 < 14 < 18
公共领域	村中与人交谈	1.799 ± 0.835	1.975 ± 0.877	1.897 ± 0.793	2.055 ± 0.826	1.952 ± 0.846	2.086 ± 0.867	2.152 ± 0.838	2.173 ± 0.906	3.185	0.002 **	11 < 13 < 15 < 12 < 14 < 16 < 17 < 18
	集市与人交谈	1.935 ± 0.853	2.043 ± 0.901	1.821 ± 0.827	1.983 ± 0.825	1.889 ± 0.846	1.910 ± 0.881	1.793 ± 0.846	2.053 ± 0.914	1.618	0.126	年齡在集市与人交谈的方言使用差异不显著
	打电话	1.669 ± 0.776	1.673 ± 0.795	1.646 ± 0.748	1.763 ± 0.774	1.603 ± 0.704	1.726 ± 0.794	1.652 ± 0.762	1.707 ± 0.767	0.882	0.521	年齡在打电话的方言使用差异不显著
	接电话	1.617 ± 0.760	1.679 ± 0.785	1.554 ± 0.726	1.686 ± 0.769	1.556 ± 0.717	1.590 ± 0.768	1.478 ± 0.703	1.440 ± 0.683	1.757	0.092	年齡在接电话的方言使用差异不显著

说明: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在与父母姊妹、同学、村中、集市以及打电话这五种情况中,18 岁的方言使用都达到最高值,而接电话在 18 岁时的方言使用低于任何情境和任何年龄段。

Bonferroni 事后检验发现,集市、接电话、打电话的方言使用不具有显著差异;在与父母姊妹、同学、村中、集市以及打电话这五种具有显著性差异,且 18 岁显著高于其他年龄。

2.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态度的年齡差異

本研究中方言态度是指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在情感(好听、亲切)和理性(难易、有用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评价。运用同样方法对方言态度的年齡差異进行方差分析,见表 5 和表 6。表 5 呈现的是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和普通话态度年齡差異的总体情况,表 6 呈现的是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在好听、亲切、难易程度、有用程度、社会影响力这五个方面年齡差異的具体情况。

表 5 年齡在普通话态度与方言态度上的 ANOVA 检验

		年齡								F	P	Bonferroni
		11 岁	12 岁	13 岁	14 岁	15 岁	16 岁	17 岁	18 岁			
普通话态度	M SD	4.371 0.491	4.561 0.542	4.562 0.512	4.360 0.573	4.539 0.465	4.489 0.506	4.457 0.492	4.187 0.746	7.216	0.000	18 < 14 < 11 < 17 < 16 < 15 < 12 < 13
方言态度	M SD	3.947 0.744	4.173 0.674	4.011 0.742	3.913 0.677	3.978 0.652	4.059 0.672	3.980 0.740	4.120 0.673	2.649	0.010	14 < 11 < 15 < 17 < 13 < 16 < 18 < 12

表 5 中,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和普通话的态度在 11 ~ 18 岁这十个年龄段中差异显著,农村中小學生对普通话评价随着年齡增长呈下降趋势(11 ~ 18 岁:平均值由 4.371 下降至 4.187);对方言评价除了 12 岁显著上升之外,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1 ~ 18 岁:平均值由 3.947 上升至 4.120)。

Bonferroni 事后检验发现,普通话态度方面,12、13 岁显著高于 11、14、18 岁,16、17 岁显著高于 18 岁;方言态度方面,11、12 岁显著高于 14 岁。

表6中,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态度的五个维度中,除了方言在好听和难易程度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差异不显著外,方言和普通话在其余方面都有显著差异。

表6 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态度的年龄差异

维度	最多使用	对象和情境								F 值	P 值	Bonferroni
		11 岁 n = 154 M ± SD	12 岁 n = 162 M ± SD	13 岁 n = 195 M ± SD	14 岁 n = 236 M ± SD	15 岁 n = 189 M ± SD	16 岁 n = 226 M ± SD	17 岁 n = 92 M ± SD	18 岁 n = 75 M ± SD			
好听程度	普通话	4.468 ± 0.658	4.642 ± 0.684	4.487 ± 0.735	4.254 ± 0.827	4.540 ± 0.725	4.402 ± 0.747	4.446 ± 0.732	4.200 ± 0.900	5.571	0.000 ***	18 < 14 < 16 < 17 < 11 < 13 < 15 < 12
	方言	3.786 ± 1.016	3.840 ± 1.125	3.728 ± 1.071	3.657 ± 0.983	3.693 ± 1.047	3.808 ± 0.910	3.804 ± 0.952	4.027 ± 0.900	1.513	0.158	好听程度在方言使用的差异不显著
亲切程度	普通话	4.162 ± 0.925	4.346 ± 0.986	4.344 ± 0.812	4.076 ± 0.795	4.307 ± 0.744	4.173 ± 0.886	4.065 ± 0.809	3.813 ± 1.036	5.060	0.000 ***	18 < 17 < 14 < 11 < 16 < 15 < 13 < 12
	方言	4.091 ± 0.924	4.333 ± 0.905	4.118 ± 0.903	4.059 ± 0.797	4.153 ± 0.781	4.222 ± 0.782	4.239 ± 0.817	4.347 ± 0.688	2.517	0.014 *	14 < 11 < 13 < 15 < 16 < 17 < 12 < 18
难易程度	普通话	4.584 ± 0.693	4.574 ± 0.694	4.626 ± 0.687	4.496 ± 0.700	4.487 ± 0.673	4.553 ± 0.672	4.489 ± 0.671	4.267 ± 0.875	2.554	0.013 *	18 < 15 < 17 < 14 < 16 < 12 < 11 < 13
	方言	4.149 ± 1.015	4.284 ± 1.112	4.200 ± 1.073	4.131 ± 1.042	4.127 ± 0.965	4.207 ± 1.031	4.141 ± 1.023	4.067 ± 1.131	0.561	0.788	难易程度在方言使用的差异不显著
有用程度	普通话	4.597 ± 0.554	4.716 ± 0.718	4.749 ± 0.501	4.585 ± 0.700	4.730 ± 0.589	4.729 ± 0.508	4.685 ± 0.553	4.320 ± 0.918	5.586	0.000 ***	18 < 14 < 11 < 17 < 12 < 16 < 15 < 13
	方言	3.987 ± 0.915	4.309 ± 0.766	4.087 ± 0.907	3.890 ± 0.892	4.000 ± 0.863	4.053 ± 0.845	3.859 ± 0.990	4.160 ± 0.871	4.159	0.000 ***	17 < 14 < 11 < 15 < 16 < 13 < 18 < 12
社会影响力	普通话	4.045 ± 1.111	4.525 ± 0.879	4.605 ± 0.691	4.390 ± 0.841	4.635 ± 0.618	4.586 ± 0.622	4.598 ± 0.612	4.333 ± 0.905	10.362	0.000 ***	11 < 18 < 14 < 12 < 16 < 17 < 13 < 15
	方言	3.721 ± 1.117	4.099 ± 0.947	3.923 ± 0.936	3.826 ± 0.865	3.915 ± 0.941	4.004 ± 0.853	3.859 ± 0.933	4.000 ± 0.930	2.637	0.010 **	11 < 14 < 17 < 15 < 13 < 18 < 16 < 12

说明：*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学生在 11 ~ 18 岁中对方言在好听(3.786 ~ 4.027)、亲切(4.091 ~ 4.347)、有用(3.987 ~ 4.160)、社会影响力(3.72 ~ 4.000)这四个维度的评价均呈上升趋势,对普通话在好听(4.468 ~ 4.200)、亲切(4.162 ~ 3.813)、有用(4.597 ~ 4.320)、社会影响力(4.045 ~ 4.333)、难易程度(4.585 ~ 4.267)这五个维度的评价均呈下降趋势。18 岁时对方言在亲切方面的评价达到最高值(4.347),普遍高于对其他四个维度的评价;18 岁时对普通话在亲切方面的评价达到最低值(3.813),普遍低于对其他四个维度的评价。随着年龄增长,掌握普通话(11 ~ 18 岁:4.585 ~ 4.267)和方言(11 ~ 18 岁:4.149 ~ 4.067)的难度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农村中小学生对普通话和方言的学习能力均在不断提高。

另外,农村中小学生对方言态度虽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 14 岁时出现显著下降后,15 岁又重新上升。这可能是因为,一是心理和年龄因素。年龄上他们正是少年期(11.12 岁 ~ 14.15 岁)向青年期(14.15 岁 ~ 17.18 岁)的过渡时期,心理上则处于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其间充满矛盾、困惑、彷徨和不安。因此,14 岁的下降可能是对方言认同迂回挫折的阶段性表现;二是暂时语言适应(short-term accommodation)^①。14、15 岁的农村中小学生正处于独立意向刚刚萌芽的阶段,当外界(教师、学校和国家)过于强调普通话而贬斥方言时,出现了在态度上不认同方言的现象。

Bonferroni 事后检验发现:方言态度方面,18 岁时对方言的亲切程度最高,12 岁时认为方言的有用程度和社会影响力最高。普通话态度方面,18 岁时在好听、亲切、难易和有用方面的评价均低于其他七个年龄段,11 岁时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最低,18 岁仅次于 11 岁;除了社会影响力以外,12 岁时在

^①方小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小学阶段的语言适应与语言认同》。

好听、亲切这两个情感评价方面均高于其他年龄段,13 岁时在有用和难易程度这两个维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

3.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他者期待的年齡差異

在日常社會語言生活中,常常存在說話者期待自己未來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某種語言的問題,但個體的語言期待很大程度上受到他者的影響。本研究方言他者期待是指農村中小學生選擇使用方言時受國家、學校和教師影響的程度。運用同樣的方法得表 7 和表 8。表 7 呈現的是他者(教師、學校、國家)對不同年齡農村中小學生方言期待的總體情況,表 8 呈現的是教師、學校、國家對不同年齡農村中小學生方言期待的具体情况。

表 7 年齡在方言他者期待上的 ANOVA 檢驗

		年齡								F	P	Bonferroni
		11 歲	12 歲	13 歲	14 歲	15 歲	16 歲	17 歲	18 歲			
方言他者期待	M	1.076	1.031	1.034	1.033	1.016	1.040	1.043	1.049	2.262	0.027	15 < 12 < 14 < 13 < 16 < 17 < 18 < 11
	SD	0.189	0.152	0.135	0.130	0.093	0.153	0.150	0.187			

表 7 中,他者(國家、學校、教師)對農村中小學生的方言期待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在 11 歲時對方言的期待顯著高於其他任何年齡階段,平均值達到最高(1.076);15 歲時對方言的期待低於其他任何年齡階段,平均值達到最低(1.016)。Bonferroni 事後檢驗發現,11 歲顯著高於 12 歲、15 歲、18 歲。

表 8 農村中小學生方言他者期待的年齡差異

條目									F 值	P 值	Bonferroni
	11 歲	12 歲	13 歲	14 歲	15 歲	16 歲	17 歲	18 歲			
	n = 154 M ± SD	n = 162 M ± SD	n = 195 M ± SD	n = 236 M ± SD	n = 189 M ± SD	n = 226 M ± SD	n = 92 M ± SD	n = 75 M ± SD			
學校期待	1.104 ± 0.306	1.043 ± 0.204	1.046 ± 0.210	1.047 ± 0.211	1.026 ± 0.161	1.053 ± 0.224	1.033 ± 0.179	1.080 ± 0.273	1.918	0.063	年齡在學校期待的方言使用差異不顯著
教師期待	1.045 ± 0.209	1.031 ± 0.173	1.031 ± 0.173	1.034 ± 0.181	1.021 ± 0.144	1.034 ± 0.181	1.076 ± 0.267	1.040 ± 0.197	0.894	0.510	年齡在教師期待的方言使用差異不顯著
國家期待	1.078 ± 0.269	1.019 ± 0.135	1.026 ± 0.158	1.021 ± 0.158	1.000 ± 0.000	1.034 ± 0.181	1.022 ± 0.147	1.027 ± 0.162	3.054	0.003 *	15 < 12 < 14 < 17 < 13 < 18 < 16 < 11

說明: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表 8 中,隨著年齡增長,國家對農村中小學生的方言期待存在顯著差異(p 值為 0.003 < 0.05),學校、教師對他們的方言期待不存在顯著差異(p 值分別為 0.063,0.510 > 0.05)。國家對農村中小學生的方言期待 11 歲時到達最高值(1.078),即對普通話的期待達到最低值;另外,國家對農村中小學生的方言期待在 15 歲時達到最低值(1.000),即對普通話期待達到最高值。Bonferroni 事後檢驗發現,學校和教師對農村中小學生的方言期待差異不顯著,國家的期待具有顯著差異,11 歲高於 15 歲、17 歲、18 歲。

(二) 農村中小學生方言認同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研究方言認同各影響因素及其關係,採用 SPSS20.0 進行皮爾遜相關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言認同各影響因素相關分析見表 9。研究數據表明公共領域方言使用、私人領域方言使用、普通話態度、方言態度、方言他者期待各變量之間相關性均顯著,其中私人領域方言使用與公共領域方言使用相關系數 $r = 0.656$,呈顯著正相關;普通話態度與公共領域方言使用相關系數 $r = -0.327$,呈顯著負相關;方言態度與公共領域方言使用相關系數 $r = 0.209$,呈顯著正相關,方言他者期待與普通話態度相關系數 $r = -0.243$,呈顯著負相關。

表9 方言认同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私人领域方言使用	公共领域方言使用	普通话态度	方言态度	方言他者期待
私人领域方言使用	1				
公共领域方言使用	0.656 **	1			
普通话态度	-0.300 **	-0.327 **	1		
方言态度	0.188 **	0.209 **	0.104 **	1	
方言他者期待	0.144 **	0.198 **	-0.243 **	0.149 **	1

分别以公共领域方言使用和私人领域方言使用为因变量,普通话态度、方言态度、方言他者期待为自变量,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见表10。结果发现,在公共领域方言使用上,Adjusted R² = 0.171, F = 94.889, p < 0.001,表明3个自变量总共能解释其总变异的17.1%。在这些变量中,对公共领域方言使用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普通话态度(p < 0.05)和方言态度(p < 0.05)。从半偏相关系数平方看,普通话态度可以独立解释公共领域方言使用10.0%的变异,而方言态度可以独立解释5.1%的变异。在私人领域方言使用上,Adjusted R² = 0.138, F = 73.941, p < 0.001,表明3个自变量总共能解释其总变异的13.8%。在这些变量中,对私人领域方言使用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普通话态度(p < 0.05)、方言态度(p < 0.05)。从半偏相关系数平方来看,普通话态度可以独立解释私人领域方言使用9.1%的变异,方言态度可以独立解释4.5%的变异。

表10 各自变量对公共领域方言使用、私人领域方言使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B	S. E.	Beta	t	半偏相关系数平方
公共领域方言使用	普通话态度	-0.400	0.031	-0.331	-12.882 ***	0.100
	方言态度	0.216	0.024	0.231	9.161 ***	0.051
	方言他者期待	0.370	0.115	0.083	3.229	0.006
私人领域方言使用	普通话态度	-0.389	0.032	-0.314	-11.994 ***	0.091
	方言态度	0.207	0.025	0.216	8.407 ***	0.045
	方言他者期待	0.161	0.120	0.035	1.344	0.001

四、结论与讨论

(一)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的困境

1.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的选择困境

选择反映行为主体的心理运作过程,使用反映行为主体的心理运作结果。从农村中小學生方言使用的结果看,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是有差异的,这种使用差异恰是學生语言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必然要经过心理的纠结和冲突的过程。从研究结果来看,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农村中小學生年龄越小,选择使用普通话越多,普通话比方言有更多建构身份的机会。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看,方言态度和普通话态度比他者期待更大程度地影响农村中小學生方言的选择。Gumperz 指出,语言使用与其所附带的社会、政治、道德和经济观念是不可分割的,语言选择参与了身份的构成与谈判。^① 从人、语言与土地共生的角度来说,农村中小學生、方言和乡土大地是同呼吸共生长的关系。年龄越小,生活在私人领域的时间更长些,选择使用方言的机会更多,方言本应多于普通话对身份建构的机会;年龄越大生活在公共领域的时间更长些,方言对身份的建构应该少于普通话。但事实恰好相反。从访谈结果看,有學生表示,“俺二伯打工回来,有时也说普通话,我就不知怎么说了。”在学校里,也有學生忧虑地说:“老师在办公室里还说方言呢”“老师有时还会

^①J. J. Gumperz, “The speech community”, in 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pp. 381 – 386.

说:‘别说土话啊,真难听!’这都造成了农村中小學生方言选择的困境。

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可能源于国家在实践中推崇单一语言——普通话,方言在无形中受到压制和贬低。我国自1956年开始推广普通话,导致普通话和方言的二元对立,“乡土中国”本为一体的局面被打破,以行政而非地域区划方言,出现“城市方言”“农村方言”的表述。因而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普通话是城市和城市人的象征,方言是农村和农村人的标签。对于农村中小學生来说,方言构成了他们的母言,普通话也并非是非域语言。但由于国家、学校和教师对普通话的较高期待,导致了他们语言选择的困境和身份角色的困扰。

2.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的情感困境

方言认同的情感困境主要指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和普通话在好听和亲切的评价存在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情感困扰。从调查问卷样本来看,1123份纸质有效问卷(网络有效问卷246份)涉及好听、亲切的选项中,有345个题项留有涂改痕迹;从统计结果看,随着年龄增长,属于情感评价的亲切和好听程度方面,方言在亲切程度方面呈螺旋上升趋势,普通话在好听和亲切程度方面则呈螺旋形下降趋势,即出现某后一年龄较前一年龄低(高)的情况,如方言好听在13岁(平均值为3.728)低于12岁(平均值为3.840),但12岁高于11岁(平均值3.786),普通话在14岁时与方言13岁时的情况正好相反。这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的情感评价处于矛盾状态。访谈中,有学生表示,“有时候觉得方言好听,有时候吧,也觉得不是太好听,不清楚。”这体现了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和普通话评价的不确定性。但涉及难易、有用、社会影响力等理性评价时,调查问卷没有一处涂改,访谈过程中学生的态度也比较明确。

造成方言认同的情感困境,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身心异域。同为“乡土性”的中国大地被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城市和农村。城市语言文化的高权势对农村文化的侵入和遏制,使得农村中小學生虽然“身”在农村,但“心”却向往城市。他们身体处在以方言为根的乡土大地,而心灵则处在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城市想象空间里,造成他们面对两种语言和两种语域选择的困惑;正如Rancz的研究发现,受全球化影响,多语言社区的区民对本语言社区有强烈的认同感,但区民中的年轻一代在当地没有根,倾向于认同其他价值观,导致方言的大量丧失^①;二是自我与他者方言情感认同的冲突。按照泰勒(Taylor)的观点,“我的认同是通过个体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②方言情感认同不仅是个体自我主观的认同过程,它还必须获得他者认同的授权,“单相思”不能建构真正的语言情感认同。学校、家庭、村落等他者努力让孩子从情感上认同普通话,但农村中小學生随着年龄增长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对方言情感认同却不断上升,这就造成了他者对普通话认同的建构和自我对方言认同的增强所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恰是个体主体意识增强与国家政策导向不一致带来的结果。

3. 农村中小學生方言认同的期待困境

方言认同的期待困境是指农村中小學生对方言态度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国家、学校、教师对方言期待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所带来的认同困扰。从方言期待维度看,方言他者(国家、学校、教师)对农村中小學生的方言期待随年龄增长逐渐降低(1.076~1.049);从方言态度维度看,农村中小學生方言态度随年龄增长呈螺旋形上升,即方言态度的数值范围为3.947~4.120。根据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观点,一个个体总是希望获得别人和社会的赞同。但研究结果却显示,国家、学校和教师对方言的期待与自我对方言的态度恰好相反,这就造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同冲突。从

^①E. K. Rac & S. Halupka-Rwsetar, “Sense of Local Identity Attitude toward Dialects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 Serbia”, *Pozna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Vol. 54, No. 1, 2018, pp. 115 - 146.

^②李丽琴:《身份认同·面子·语境——基于对挪威人和拉普人的语言态度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访谈中了解到,学生面对这种冲突学会了“圆滑”处事的模式,“跟长辈在一起,尽量说普通话,跟同伴在一起,就说方言。”

上述困境可能源于语言身份的冲突。选择一种语言即选择了一种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①中国城乡的二元对立,造成了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对立。普通话成为城市文化的象征,方言成为乡土文化的标志;普通话建构了高权势的语言身份,方言则建构了低权势的语言身份。他们正是按照这种观念进行语言的选择。如有学生在访谈中谈到,“我们在一起玩吧,有从城里回来的,就说普通话,感觉好听,文明。”

(二) 进一步讨论

本文在更普遍意义上的学术关注是:如何在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理解多语言认同问题。这是当前有关认同的热门话题,本文在两方面可能拓展现有理论。

1. 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欧洲委员会语言投资委(The Council of Europe's 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 ELP)认识到语言多样性对促进多语言欧洲的流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②多语言既满足个体对外部语言的工具性需要,更是满足个体内部的主观需要,即获得工具性语言的生存需要和“我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精神需要。另外,从外部政策环境来看,欧洲一体化和重组支持欧洲委员会促进“多语制”,将其作为民主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③

中国恰恰是一个多种语言共存的国家。汉语中的七大方言与方言的变体——普通话——之间是并列平等的兄弟关系,而不是具有尊卑贵贱的上下级关系。在我国的社会实践操作层面上,往往无意识地将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造成二者之间的隔阂。而在本源和制度层面,方言和普通话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杨光在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发言说,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在我国,普通话是吸收地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言)成为普通话词汇系统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方言表达,如“拍拖”“打的”等粤方言,“撒丫子”“酷哥”等北方方言,都是后来纳入到普通话系统中的词汇。因此,方言和普通话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平等关系。

2. 方言认同是静态性还是流变性的问题

方言认同是静态性还是流变性的问题是当下认同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研究没有将认同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把认同局限在相对固定不变的地域和人文环境中去探讨,由此形成的理论假设是:认同是静态的,同一主体在不同阶段其认同保持不变。主体固着在相对固定的地域、种族、阶层、性别和身份等社会结构中,在农村中小學生身上的具体表现则是,说方言就标识其“农村人”身份,说普通话就标识其“城市人”身份。

而近年来认同建构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建构论认为,语言认同是在历史、文化、权力等因素作

^①J. J. Gumperz, “The speech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pp. 381–386.

^②E. Ushioda, “Language Motivation in a Reconfigured Europe: Access, Identity, Autonom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27, No. 2, 2008, pp. 148–161.

^③S. Breidbach, “Plurilingualism Democratic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the Role of English”,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2003, pp. 11–12.

^④苏新春:《普通话词汇系统对方言词的吸收与更新——〈现代汉语词典〉方言词研究》,《语言》2001年第3期。

用下,由个人和群体在语言实践中持续不断地建构而成的。语言既表达了认同,也在建构着认同。”^①学者俞玮奇对南京市中小学生的调查同样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方言认同不断增强,而对普通话的认同却不断下降^②;学者方小兵的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方言认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年级的方言认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表明,在实践中已呈现出静态方言认同向动态方言认同转变的事实。本研究中农村中小学生的方言回归即是方言认同具有流变性的表现。

(责任编辑:陈 雪)

An Empirical Study o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Dialect Identity

ZHAO Cuilan, SU Chunjing

Abstract: The dialect identity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native Chinese culture. Taking 1,369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11–18 years old) as a sample, we used questionnaires as the main instrument and interviews as the auxiliary to collect the data and employed analysis of varianc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textu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dialect identity in terms of the use of dialect, attitude towards the dialect, and the expectation of other people on the dialect. The study f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use of dialect by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on the rise, but the use of Putonghua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has an absolute advantage as the age increases. The positivity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dialect increases, while that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Putonghua decreases with their age increasing.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tate, the school and the teacher on the dialect decreases with their age increasing.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dialect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dialect and Putonghua, and the expectation of others on the dialect. The attitude towards dialects and Putonghua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use of language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identity dilemma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dialect choice, dialect emotion, and dialect expectation. We should further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s and Putonghua a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dialect identification is static or dynamic.

Keywords: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dialect identity; empirical study; linguistic diversity

About the authors: ZHAO Cuilan, PhD in Educatio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U Chunjing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00).

^①方小兵:《当前语言认同研究的四个转变》。

^②俞玮奇:《城市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年龄变化——南京市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